

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
——重温习近平《加强脱贫攻坚第一线的

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一些党组织将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未能同时兼顾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党建、业务“两张皮”问题，导致农村党组织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农村党员得不到应有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有些农村党员干部知识不足，以致农村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被弱化、虚化甚至边缘化，更有甚者认为“不要党支部”；同时，有些农村党员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思想行为发生滑坡，出现“用金钱代替宗旨、用实惠代替理想”的问题，放弃了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那么如何解决新形势下农村党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呢？习近平敏锐地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通过“发几个文件、开几场会、处理一些党员、进行几次党员评议就能奏效的”，而是“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切实建设好农村党组织。

一是明确指导思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是党组织团结凝聚群众，发挥核心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回顾道，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凝聚团结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顺应农民群众的共同意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正如毛泽东曾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是我们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革命年代如此，不断变革的今天亦是如此。发展经济、共同富裕成为农民的共同愿望。因此，农村党组织应带领广大农民投身于发展经济事业，走共同脱贫致富的道路。农村党组织各方面的建设也必须围绕这个主旋律来“弹钢琴”，将自身建设成为农村事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坚强核心，使广大农民群众在日常实践中得出“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的共识。

二是发挥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党支部在农村各种组织中的核心地位是农村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的前提。农村体制改革不能动摇党组织的核心地位，不能削弱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必须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而得到强化。但“确立农村党组织的核心地位，绝不是让党组织孤军作战”。习近平借助大合唱团来形象地说明农村党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农村党组织是“合唱团的总指挥”，村委会、村合作经济组织等其他组织要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如此才能唱好“经济大合唱”，共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是加强自身建设。农村党组织建设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组织核心作用的发挥。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什么样的村党支部说话没力气，农民不愿听，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作用已经是日薄西山。为此，1989年1月7日，他就加强党的建设作出重要批示，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搞好基层组织建设，调整不适应、不协调、不健全的“三不”班子。在他的大力推动下，1989年宁德地委统一部署实施的“堡垒工程”，整顿、调整了429个农村基层党组织，评出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党员3650名，占党员总数4.4%，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和队伍，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外，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宁德地委在全区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再学习再讨论，此举不仅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拓宽了知识视野，而且及时调整修正了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促进了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改进工作方法。随着农村的改革发展,农村经济体制、农民经济利益核算机制等都发生了重要变革。因此,农村党组织必须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变化新要求,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而“不能翻老皇历办事了”。习近平列举了农村党组织一些新的具体工作方法,如“深入家家户户,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农民的心坎上”“应当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应当通过为农民办实事,密切党群关系”等等,来团结和凝聚群众。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党组织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发生了重要调整,面临一些新的任务。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调研,习近平发现,农村绝大多数党组织在农村改革新形势和脱贫致富工作中,“经受住了改革、开放、脱贫致富的考验,成为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带头人”,但少数党组织出现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不见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等问题。那么这些问题

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试验区，也是进行改革的先行区。特区的发展强烈呼唤“新事新办，特事特办”。1980年代，谷牧主要抓了两方面改革：一是通过简政、放权、让利、减税等举措，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二是突破计划经济模式，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作了重要的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谷牧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工作。他既参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又是这些政策的组织实施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为1980年代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结束后，我国逐渐恢复了与许多国家的交往。1978年，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出访就有20次。其中5月由谷牧率领的

中国政府代表团对西欧国家的访问，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中，谷牧等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考察报告中大胆提出：要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在外贸体制上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我们的上层建筑必须要改革，资本主义并没有没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東西。6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听取谷牧的汇报，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讲了一番话，主要内容：一是引进先进技术这件事要做；二是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在7月份召开的为期两个月的大国务院务虚会上，谷牧又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良好机会，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自我封

闭、贻误时机了。与此同时，其他考察团的同志也纷纷提出对外开放的建议。谷牧等人的意见，最后凝聚到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1978年赴港澳考察团在汇报时，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省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利用港澳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先行一步，拟在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基地。党中央、国务院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并要谷牧同他们具

体研究。1979年5月11日，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为期20多天的调查研究，逐渐勾勒出两省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他们的报告，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举办深圳等4个出口特区。

为了解决两省和特区可能遇到的困难，谷牧多次召集会议进行协调。从1980年至1988年，每年的两省工作例会或特区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上年工作，解决下一年工作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在谷牧领导下，共制定了7个中央文件、9个国务院文件，指导了特区的健康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当深圳罗湖小渔村搞“五通一平”缺少“酵母”时，

谷牧帮助协调 3000 万元贷款作为启动资金；当厦门特区因建设湖里而缺钱发愁时，他提出国家建设也可以向外国借钱；当厦门为兴建机场而四处筹钱时，他直接找外经贸部，协调向科威特海湾基金会贷款，开创中国民航业利用外资的先河。

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新事物，成立伊始就迎来各方关注的目光，各种议论也接踵而至。许多部委发出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概不例外”。这时，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了走私贩私泛滥的严重情况。1982年3月，上海一家报纸刊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对深圳特区加以影射。

对此，谷牧运用事实对特区的发展作了辩护。他说：有一些引进外资的变化，管理方面的变化，不过是做了些改革的试验，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试验进行下去呢？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还是要坚持把经济特区这桩事向前推进！恰在这时，国家进出口委员会被撤销，谷牧顶住压力，选择八个人组成的特区工作组，处理相关事务。谷牧给小组成员交任务：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谷牧一个人的。

在打击走私基本告一段落后，谷牧下了很大功夫，经过调查研究，对特区的性质和功能、特区发展的初步评价、特区的管理自主权等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样，特区要办，并且一定要办好的旗帜又高高地举了起来。1984年邓小平在接见沿海城市座谈会代表时说，抓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有人说，邓小平说的就是谷牧，谷牧谦虚地说，这是对全体与会者，也是对我的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谷牧曾主持国家的基本建设工

作，对特区初创中摊子铺得太大等问题保持高度警惕。1985年2月，谷牧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他强调，特区不能满足于盖大楼，要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会开了，但效果不大理想。谷牧意识到需要系统地做工作了，于是采取一系列办法解决问题，同时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对深圳特区的领导班子进行适当调整。1985年底，谷牧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要求特区发扬“开荒牛”的劲头，从搞基建、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会后各特区统一认识，认真贯彻落实，成为开拓前进的新起点。1986年，深圳从建设计划中消去18层以上的高楼51座，基建规模比上年压缩30%，但从整体上看四个特区产值比上年增长了24%，外贸出口增长27%。

1982年12月，中央委托谷牧研究海南岛的开放开发问题。从此，谷牧一直关注着这个海岛的发展。1983年2月，谷牧到海南岛进行调查研究，并组织有关部门与广东省、海南岛有关人员讨论提出综合意见汇报中央。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提出以实行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决定扩大海南的自主权，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比照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做法。海南由此成为“不是特区的特区”。

在长期的调研后，谷牧认为，要想加快海南岛的开发，还需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同时加大开放的力度。1987年5月，他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开放的一些初步设想》，提出将海南岛单独建省、办成经济特区、赋予更多经济自主管理权限的方案。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他的设想，责成他着手筹备海南岛经济特区。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12月上旬，谷牧在海口召开专门会议，就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开发建设问题进行研究。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两个决议。

 党史人物

周保中，云南大理人，白族，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杰出领导人。他是历经14年抗战全过程，看到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和新中国诞生为数不多的东北抗联高级将领；是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唯一原东北抗联领导人。毛泽东曾称赞说：“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奋战游击疆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从苏联回国，经中共中央派遣到东北工作。他先后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兼党委书记、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委，领导了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总结游击战争实践经验基础上，周保中首创“小群游击队活动”和“游击根据地之建立”的概念。“小群游击队活动”，是指在我军力量较强，攻击敌人弱点时，可开展一般意义的游击战，而在敌军力量很强，我军力量很弱时，可以利用“小群游击队活动”的方式与敌人战斗。这种方式，一要“小”，二要“群”，或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机动灵活地对敌开展斗争。而“游击根据地之建立”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东北的抗日军队很难建立起长期的、巩固的根据地，而“游击根据地”的特点是不固定，也就是所说的“根据地搬家”，在敌

人“大讨伐”中不固守根据地，不因固守而遭受巨大牺牲，这是符合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实际的。后来，吉东地区的游击战争在周保中领导下基本是按照这一方针开展的。

在游击战中，周保中经常教育战士不要做“半截子”革命派，不要做可耻的逃兵；要习惯艰苦生活，不要怕困难。周保中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他每天睡得很晚，大家睡下之后，他仍在马灯下写东西，直到深夜。临休息前，他要到营房内外巡查一遍，检查每个战士的情况，看大家的鞋子是不是烤干了……他怕战士们睡觉时冻坏，不时叫醒大家，让烤烤火，活动一下身体醒后再睡。周保中这样无微不至关怀战士，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配合全国抗战。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兴起。8月25日，周保中以东北抗日救国总协会名义发布《关于目前东北抗日救国宣战动员的紧急通知》，要求东北抗日联军和各义勇军逐渐集结兵力，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粮栈仓库、通信设施；广大民众要以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援助抗日联军、各反日义勇军，在军民联合一致行动下，破坏日贼军民分离政策、坚壁清野政策。

根据周保中关于响应全国总抗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抗联第五军各部积极行动，以顽强的战斗打击敌人，使日军疲于奔命，

一天24小时不得安宁。如1937年8月13日，抗联第五军与第二、四、八军各一部共250人，对在三道通修筑兵营的120余名日军发起攻击，经半日激战，致敌死伤40余人。8月15日，第五军在山口向阳站附近袭击敌人军车，打死日军70余名、伪军20余名，伤日军30余名、伪军20余名。

全国抗战兴起后，周保中始终密切观察形势的发展，以中华民族的崇高风骨鼓舞抗联将士英勇斗争。可以说，他在吉东领导的抗日斗争与杨靖宇在南满、魏拯民在东满、赵尚志在北满领导的抗日斗争遥相呼应，积极地配合了全国总抗战。

迎接胜利曙光。在东北抗战后期，特别是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杨靖宇于1940年牺牲之后，周保中独撑危局，成为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东北武装抗日斗争的首脑人物。

在 1940 年秋还遭到巨大困难和挫折以后，东北抗联大部转移到苏境整训、补充。为便于对越境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经过苏保中等抗联领导人的多次交涉，苏保同意在远东境内设立南北两个临时驻屯所（也称“野营”），越境部队分别集中在野营内。为搞好营建工作，周保中号召抗联将士到山里采伐木材，自己动手设计、建设营房和俱乐部等。俱乐部悬挂毛泽

东、朱德画像，表达了抗联将士想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心情。

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组成，周保中任旅长。在周保中的带领下，抗联将士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开展了文化知识学习和娱乐活动，促进了抗联将士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思想的不断进步。他还领导教导旅有计划地进行系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并组织一些特殊技能训练。一般军事训练为队列、刺杀、射击、投弹、瞄准等项目，同时也学习战术、军事地形、爆破等课程。特殊技能训练，主要是空降和滑雪。周保中多次参加空降跳伞训练，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在部署紧张军政训练的同时，他还持续不断地派出小队部队回国秘密开展敌占区边境活动，乃至腹地深入侦察工作，搜集情报，以备回国反攻。

1945年中共七大后，在周保中领导下，抗联教导旅积极准备参加全国抗战总反攻。为了保证抗联指战员在反攻作战中自觉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做到步调统一、纪律严明，教导旅草拟了政治、组织和行为3个方面的《备忘录》，为东北抗联参加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伟大斗争起到了重要的规范、警示作用。

史海拾贝